

最近，我所在的城市举办关于翻译理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要我参加。说实话，我一般不参加此类会议。这是因为，我所了解的翻译理论加起来也肯定多不过当年我实验过的高产玉米种植法。再说玉米即使不高产也总能结出棒棒，而翻译理论什么也结不出来。但说归说，参加还是要参加的。毕竟要我上主席台就座，别不识抬举。

台我是上过的，校内讲课也好校外讲学也好，总要上台讲。但讲台不同于主席台。大席台？我在脑海里排出各级人大政协会议全体会议的主席台：一行人西装革履，举止庄重，神情肃然，还有迎宾曲……于是我也决定西装革履。意大利品牌藏青色西装，若干年前为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特意购置的，浅蓝色纯棉免烫衬衫，落叶飘零图案的书卷气领带，就差左侧小口袋没露出白手帕的尖尖角了。出门前再次对着镜子确认一遍：风流倜傥，无可挑剔，全然看不出是年过花甲之人……

然而，人世间果然充满不确定性。步入会务大厅就觉得不对头：前来报到的各路精英们，西装革履者一个也没有！准确说来，穿西装者倒是，但都没打领带。所有领带都从脖子上不翼而飞。尴尬之余，我问负责筹备会议的一位同事，你这西装怎么没打领带啊？“昨天开预备会本来打领带带着，结果发现只我一个打领带，所以今天就……”同事盯视我的领带，笑笑。我也盯视我的领带，没笑。不知是索性解下来好，还是姑且系着好。最后决定系着不动，在人数绝不为少的大厅里忽然解领带反而不自然。

很快进入相当堂皇的会场。四下打量，近一百来宾中没人打领带，一个也没有。合谋孤立我不成？女士玉颈的装饰性围巾倒是有的颇像领带，问题是再像也不是领带而是围巾。

刚想找个角落潜伏不动，却被不由分说地拉上主席台。台上算我一排坐了六位。一半是京沪高级别人物。不过我关心的不是级别而是着装。三位穿单件头西装而没打领带，两位穿夹克款式休闲装。总之一身西装且打领带者只我一

领带哪儿去了？

个。不过奇怪的是，这回我倒没觉得怎么尴尬，俨然级别更高的首长顾盼自雄。集体照相时身旁一位相识的本地女教授颇为认真地看了一眼我的“落叶飘零”领带，善解人意地夸奖说领带跟季节很搭配，身上树上都落叶飘零！还说正规场合还是穿西装打领带好，也是对场合的尊重嘛！

女性到底对着装敏感。我不由得想起去上海一所大学开会时一位女同行的一番话来：“你看那位男士，水平倒是足够，可一身鲜红鲜红的羽绒服也好意思上台发言？再看人家日本人，西装革履！也不知怎么搞的，你们男人钱包越来越鼓，可穿得越来越像瘪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穷时候还有不少入西装革履来着……当老师多少总有个着装要求……”

是啊，当老师总有个着装要求。为什么着装越来越随意了呢？我想了想。噢，都怪PPT！以前没PPT，老师上课或上台发言都居于正中讲台的正中，众目睽睽之下，自然注意仪表，注意着装。如今呢？讲台靠边，老师跟着靠边，正中让给PPT一道道闪烁不定的青白色投影。老师几乎躲在角落里一味低头对着电脑界面，不迎面对着学生。而学生也不对着老师，只顾对着PPT。如此这般，老师自然无需注重仪表，无需西装领带了。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还有老师个性表达一面。偶尔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得北大曹文轩回忆谢冕先生的文章：“做人作文，若无个性，多少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谢冕先生做人是有个性的：当人们普遍滑入平庸的现实主义情景时，他却一如既往地倘佯在浪漫主义的情调中。而当人们普遍接受无边的自由主义，一身随意打扮踏入一个庄重会议的会场时，我们却一眼看到他一丝不苟地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坐在那里。”

不过，作为我可不敢和谢冕先生比。索性实话实说好了，我所以时不时西装革履，根本原因是我的人生也已进入落叶飘零时节——难道要我退休后西装革履去农贸市场买菜或歪在小区石凳上打瞌睡不成？



贞观盛会 (油画) 孙景波 李丹 储芸声

上海诗词学会成立30周年了。我和学会的关联是后18年。很荣幸18年来，我一直参与着学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也很惶恐，较之学会前12年的前辈领导和会员，我们这一茬是十分羸弱的。

18年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诗词的当代性问题。这个想法起先是一闪而过，后来是认真了。起先写诗词的人极少，如今好多好多。当代性的问题自然就有实践可以检验了。

文言文系统的诗词在当代为什么还活着？当代的李白和杜甫又会怎么写？这些问题，还得从诗词本身找答案。

诗词是什么？更确切地问，该是：“诗是什么？”诗词本原上就是诗，词只是“诗之余”。中国从来是诗的国度。诗是写意的思维。别小看了“写意”这两个字，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从来认为，人对于天地的探索，

永远无法穷尽。而人心和天地一样，也永远可以探索。选择人和天地合一的思维，是中国人最勇敢和最智慧的选择。无法穷尽的探索，只有写意的思维，才是与之契合。于是产生了写意的中国字，产生了甚至不在意语法的写意的文言文。而这样的写意的文和字，最美的成果，就是诗。

由此可知，诗是有关或者说直指人心的。那么，既然人心是永远的，诗就必然出现在任何时代。所以诗，先秦有，汉代有，唐宋有，明清也有，而且都是那么好。史实表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学史观，是缺乏常识的。中国文学史，说到底就是人心的历史、诗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李白和杜甫的诗，为什么还活着；文言文系统的诗词，为什么

夜光杯

与年届九旬的吴钧陶老人交往，大概已有二十年了。每次见面，都让我感受到，老人的一颗宽厚仁慈之心。

以最近的一件小事来

悠远的云影

韦 浹

说，他的保姆宁阿姨，因家乡安徽采茶较多，无法及时销出。吴老师听说后，明知自己没有助销渠道，却两斤三斤地自掏腰包购买，除留一些自用或招待来客，大多分赠亲朋好友。更不用说，他尽自己所能，帮助文朋诗友，完成各自的事业。那年出版社打算组织十来位翻译家翻译米切尔的《乱世佳人》，可是找不到原著，吴老师闻悉，把珍藏几十年的原版书奉献出来，为加快翻译进度，不得不将好端端的原书拆散，给译家分头翻译（那时没有复印机）。别人见之，很感可惜，吴老师却以此为乐。

顺便提一下，吴老师是著名藏书家，曾获上海首届十大藏书家荣誉。上世纪九十年代，报上号召捐建希望小学，吴老师觉得家中藏书还值几个钱，愿意捐出冰心等旧版文书，期望以拍卖所得去帮助建个“帐篷小学”。闻听孙大雨的专著因印数不足而无法出版，他更是古道热肠，在报上撰文大声疾呼。

他的同辈，他的后进，都愿意与他交往。我常常听他谈起这些人与事，就“敲边鼓”希望他花些时间写下来。这样，我就见证了他写屠岸、写王智量、写钱春琦等文的刊发过程。别家写人物，由一点小事衍化成一篇大文章。而吴老师写人物专稿，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写一部人物传记。他是有剪裁、有节制地浓缩了传主的主要精神与经历。比如他写老友钱春琦先生，不但与传主聊了很多次，还几乎翻阅了传主的所有著译，又把需了解的问题一一写信告知传主，在得到或修正或确认后，他才放心地投入写作。一稿二稿三稿，一遍遍修改直到定稿，可谓精准扎实，精练丰满。

吴老师在翻译之余，还写下了为数不少的涉及翻译的长文短制。这些文章，有一定的专业性，又不为读者所容易读到。其实，这里有外国作家的轶事，有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也有吴老师的翻译艰辛和理念。如今，我把吴老师写人物与谈译事的文章编为一集出版，正是读者所盼望和期待的。

吴老师是翻译家，三十年前他从译文出版社退休。他翻译的狄更斯《圣诞欢歌》、史蒂文生《错箱记》、罗卡尔《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等，几十年来一再版，成为经典名著加上名家名译。他还把中文译成英文，如《鲁迅诗歌选译》《杜甫诗新译》等。吴老师是诗人，系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的诗歌会员。五十年代因诗罹祸，戴上“右派”帽子。新时期后，先后有《剪影》《幻影》《吴钧陶短诗选》等多种诗集问世。

但是，吴老师最早写作的体裁，却是写人物的文学传记。而第一部专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自传体纪实作品《药渣》。可惜，这部十多万字的处女作，当年因故未能付梓出版。1952年至1953年，他在太平洋出版社连续编写出版了三种人物传记小册子，即《高玉宝传》《马特洛索夫传》《卓娅传》。他在文学翻译和诗歌创作外的文字，是最不为人知的。所以说，《云影》是他在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文集。我很珍惜为吴老师编选此书的难得机会。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在我眼中，更视为重于泰山的责任。

吴老师读初中时卧床六年，患的是骨结核病。但凭着坚韧的毅力，他自学创作与翻译，做到了“妙手著文章”。而他的“铁肩担道义”，更令我折服。他以病弱之躯，担起了超乎寻常的社会道义，他有乐善好施的仁慈，有心系民众的大爱。借《云影》的出版，以及这篇短小的编后记，以表达我对老一代知识分子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之敬意。

(本文为《云影》编后记)

丽娃忆旧八首

胡晓明

余自丁卯年入此校，忽忽近卅载矣。步张梦机先生韵，亦成八首。

一
光阴如水鬓如银，
楼馆书灯老更亲。
消遣最难离别季，
骊歌满地不胜春。
二
夏雨新荷对语柔，
诗人旧梦与谁游？
一番骤雨风狂后，
惟有青青芳草幽。
三
文史楼前月一弓，
当时年少景尤雄。
诗书漫卷千秋意，
一地樱花堆锦红。
四
丽娃美景奈何天，
春柳千丝拂画船。

最忆文思枯壁尽，
心旌摇曳舞衣边。

五
馨香一柱酒深斟，
申酉魂归失路津。
莫向丽虹桥上立，
一行雁字点秋心。

六
秀清潇洒自有神，
如花蹴鞠乱分身。
小儿无赖老夫伴，
一醉绿茵乐性真。

七
曾向百花头上开，
文章师大亦多才。
冲寒梅骨今何在，
冬至阳生春又来。

八
后街小吃九回肠，
压酒吴姬劝客尝。
最是夜深人静后，
逾墙呼友火火锅香。

中国传统节日有一个系列整齐而有趣，即月和日数字复叠者：一月一新年、三月三上巳、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阳。这些“奇数复叠”的是“大节”，另外还有两个插在中间、偶数复叠的“小节”：“二月二龙抬头”，六月六“晒衣节”，可过可不过，所以叫“不拘小节”——这才是成语的本义。至于后来指称人之性格，那已经是引申义了。

二月二：不拘小节

翁敏华

正值早春，自此雨水就多起来了，民间俗信那是天上的龙在空中耕云播雨的结果。北方缺水，春雨贵如油，更是把一年的农事希望寄托在“龙”身上，所以北中国的“二月二”节过得比南方起劲。二月二那天，地头田埂，晒场宅院，到处可以听到孩子们扯着脖子喊：“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二月二这一天龙抬不抬头，头抬得高不高，关乎秋后的收成、一年的生活质量，所以还有个相关的谚语道“龙不抬头人抬头”——盼下雨。

传统节日是民间智慧的集中体现。老百姓常拿节日说事儿，形成了许多老话儿、老礼儿、谣曲儿。按照老礼儿，二月二那天不能动剪刀针线，说是如果动了，“一不小心，扎瞎了龙眼，划破了龙皮，这可怎么得了！”于是人们宁可信其有地遵守着，约定俗成着。换一个角度想想，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给女人家放假呢！在传统中国，做女人极其辛苦，特别在乡间。跟男人一样下地不算，回到家，洗衣做饭，纺织缝补。但是中华传统文化里也有特别人性的地方，比如节日里，每每就有禁止干活的活儿，比如正月初头不扫垃圾，寒食清明不动火等等。那些吓唬人的话，其实是一种保证，让特别勤劳的女性，也得以有一天的休闲。真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动静交替劳逸结合。

那么，不让干活做什么呢？一个字：玩儿！唐诗人白居易有《二月二日》诗云：“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男人玩女人也玩。清代有一首小曲《粉红莲》：“二月之二来三月柳儿三，娘家接我去打秋千，起在半悬天。哟，起在半悬天。大红的裤儿衬着柳绿儿衫，肉儿小心肝。风摆罗裙露出金莲，肉儿小心肝。风摆罗裙露出金莲。”

多么有声有色的画面，多么生动活泼的民歌！二月二就是个玩的日子，故又名“踏青节”、“百花节”。

二月二不拘小节，可过可不过。上海应该过，因为上海是“龙头”。舞龙灯、吃龙须面、唱《龙的传人》，还可以到龙王庙或上海龙华寺走一遭，给家里老人送一柱龙头拐杖，过节的形式内容还可以有许多创新。



夜光杯

十日谈

风云诗会

加入诗词学会三十年，请看明日本栏。